

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及其特点

万雪玉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公元7世纪后期, 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占据呼罗珊而传入今中亚南部地区, 并由南而北, 以战争、商贸和传教士等形式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后, 最终普及中亚。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 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对当地社会、民族及原有文化很强的适应性。

关键词: 中亚地区; 伊斯兰教; 传播

中图分类号: B96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05)03-0060-05

Islamizing Course and its Characters in Central Asia

WAN Xue-yu

(Institute of Humanit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late 7th century, with the Arabs holding the Huoshan area, Islam was introduced into today's southern area of the Central Asia from south to north. In forms of wars, trades and missionary, etc, Islam went through five seedtimes, finally popularized in the Central Asia. In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in the Central Asia, Islam put up much flexibility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to the Central Asia's society, nationality and origi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Central Asia; Islam; spreading

伊斯兰教从公元7世纪后半期传入今中亚南部地区(本文的中亚地区指的是现在中亚五国的范围), 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了。伊斯兰教覆盖整个中亚地区, 则经历了千余年的时间。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的传播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 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中亚南部地区, 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早, 当地民族的宗教意识比较浓厚; 而中亚北部草原地区, 伊斯兰教传入和普及的时间比较晚, 各民族的宗教意识相对淡漠。

一、传入时期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是在阿拉伯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前期, 征服者用战争和经济手段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南部农耕地区。

阿拉伯人在攻占了一个新的地方后, 即向当地居民传播伊斯兰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可以得到与穆斯林同等的待遇, 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可以

得到保护。如果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 就要向征服者交纳人头税。如果既不愿意缴纳赋税, 又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 他们则面临着战争。如果在战争中被征服, 就成为俘虏, 沦为奴隶。在对外扩展基本停止以后, 大批奴隶信奉了伊斯兰教, 成为释奴。在四大哈里发统治时期, 是不鼓励异教徒改奉伊斯兰教的, 原因是为了增加税收, 特别是人头税的收入。改宗者越多, 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少。到了倭马亚王朝时代, 由于连年对外扩张, 兵员缺乏, 开始大量吸收外族穆斯林参军。阿拔斯王朝时期外族穆斯林参军者更多, 其中就包括中亚南部地区的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也纷纷入教, 参加了阿拉伯人的军队。外族穆斯林在军队中所占比率的增加使国家的税收减少, 而且国家还要向军人支付年俸, 导致财政负担加重。阿拉伯人对外扩张初期, 对异教徒中的儿童、老弱、妇女、僧侣等, 一律免交人头税, 其他税额也不是很重。到了倭马亚时代, 特别是到了8世纪

收稿日期: 2005-04-02

作者简介: 万雪玉(1961-), 女, 新疆石河子人, 汉族,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硕士。研究方向: 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民族、历史。

初期,不分老、幼、病、残、僧侣,普遍征收人头税,税额也有增加。各族居民不堪其苦,纷纷改奉伊斯兰教,以逃避税收。公元8世纪初,由于改宗的人太多,一度造成阿拉伯人税收枯竭,伊拉克总督哈查吉被迫下令:虽然信奉伊斯兰教,也必须交纳丁税。^{[1](P100)} 结果导致中亚等地大量“新穆斯林”纷纷退出伊斯兰教,恢复原来的宗教信仰。继任者被迫废除了这一命令,才使得异族人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原来放弃伊斯兰教的人又纷纷重新信奉伊斯兰教,再次成为“新穆斯林”。

阿拉伯人向半岛外移民,与当地入杂居,阿拉伯男性逐渐与当地女性通婚(倭马亚王朝绝对禁止阿拉伯女子与异族男性通婚),出现了混血儿。倭马亚人歧视混血儿,称呼他们是“卑贱的杂种”。混血儿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继承财产,不能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不许充当领导礼拜的“伊玛目”。阿拔斯王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阿拔斯人的胜利主要依靠的是伊朗和呼罗珊地区的新穆斯林,因此该政权建立后,混血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逐渐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成为哈里发身边最受重用的群体,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他们是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者和坚定传播者,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从其向外扩张初期就开始了,关于这一点,著名的阿拉伯学者艾哈迈德·爱敏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你以为波斯人或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或罗马人、或科普特人,改奉伊斯兰教以后,便完全抛弃了千百年来祖先遗留下来的信仰了吗?你以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教训能如伊斯兰教所要求的那样去了解吗?不是,决不是如此的。波斯人的上帝观,决不同于罗马基督教人的上帝观;波斯人、罗马人的上帝观,又决不同于埃及基督教人的上帝观。就是许多宗教的术语,如地狱、天堂、魔鬼、天使、末日、先知等等,也是各有自己不同的含意。这些人奉伊斯兰教后,纵然成为虔诚的笃信者,也不可能如阿拉伯人那样去理解伊斯兰教的内容。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必定搀杂着本族许多古代宗教的传统;每一个民族了解伊斯兰教的术语,必定模拟它,使它近似自己的宗教术语。”^{[2](P102)} “宗教虽然胜利了,却受到了外来的影响,穆斯林中产生了若干派别,各派的人,都根据从别的书籍中所得到的东西,以注解《古兰经》如创造天地之类的传说。各个派别,又时以文字为辩论的工具,有时以

刀剑为斗争的武器。”^{[2](P101)} 传入中亚南部农耕地区的伊斯兰教,也同样在其传入初期便开始了吸收当地文化内容的过程。

二、向外传播时期

公元9—10世纪是伊斯兰教在河中普及并开始向外传播时期。公元9世纪上半叶,中亚当地居民摆脱了阿拔斯王朝的直接控制,先后属于当地贵族首领建立的三个政权:塔希尔王朝(821—873年)、萨法尔王朝(873—903年)和萨曼王朝(874—999年)。这三个东伊朗语居民政权的建立者从阿拉伯征服者手中接过了伊斯兰教的大旗,打着“圣战”的旗号向外扩张,伊斯兰教在河中地区成为占据优势的宗教并传入周边地区的异教徒中,进而传入游牧的突厥人中间。伊斯兰教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完成了在河中农耕居民中的普及,同时开始向外传播。成书于萨曼王朝时期的《世界境域志》记载说,河中地区的居民是积极的圣战者,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纯洁的。^{[3](P76)}

萨曼王朝时期,“河中”与“突厥斯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理概念。前者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萨曼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后者指锡尔河以北以东的草原地区。《世界境域志》把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花刺子模的柯提等地称为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说明这些地区尚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居住在临近萨曼王朝边境而不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阿拉伯人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曾经是奴隶贩子贩卖的主要对象,特别是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富汗南部山区的突厥人。根据许序雅先生考证,突厥人最早出现在河中地区是在8世纪初,“不过他们不是成群结队地迁徙,而是作为奴隶或服兵役的冒险家而来。”^{[4](P161)} 倭马亚王朝时期,突厥奴逐渐进入阿拉伯和波斯贵族家庭。9世纪中期,阿拔斯宫廷中开始出现由突厥奴组成的宫廷卫队。塔希尔王朝时期,每年有数千名突厥奴被作为礼物送到哈里发宫廷中。突厥人来到河中地区以后,依附于萨曼王朝和军事贵族,接受了伊斯兰文明,他们通过军功和与萨曼王朝统治者的斗争而得到升迁。一部分突厥将领由于掌握了部分政治权利和私人武装,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军事贵族集团。到10世纪中叶时,突厥奴开始控制萨曼王朝的宫廷和近卫军,掌握国家的军权,并最终建立了突厥语王朝(哥疾宁王朝),开辟了中亚突厥人统治时期。突厥人通过控制和干预萨曼王朝政局,在政治上不断排挤伊

朗语族人,使得中亚南部农耕地区突厥化因素不断加强。而突厥人不论是作为奴隶还是志愿者,他们在进入河中伊斯兰地区不久就成为了穆斯林中的一份子,即突厥人在政治上对河中伊朗语居民加强影响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伊朗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实现了自身的伊斯兰化。河中地区成为整个中亚地区伊斯兰教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地区,这里的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成为中亚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

11—12世纪是中亚南部地区伊斯兰教普及和迅速外传时期,表现为突厥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呈压倒优势,先后在锡尔河以东以南地区建立了卡拉汗王朝(9世纪中叶至1212年)、哥疾宁王朝(977—1186年)、塞尔柱王朝(1040—1157年)和花剌子模王朝(1077—1221年)。突厥人作为中亚地区的统治者,使当地居民在语言方面实现了突厥化,同时使突厥人在宗教方面实现了伊斯兰化。突厥化、伊斯兰化在中亚地区文化上的表现则是形成了突厥—伊斯兰文化。“河中地区”与“突厥斯坦”这两个地理名词随着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范围的扩大逐渐合而为一。出现较晚的“突厥斯坦”这个地理名词取代了古老的“河中地区”而成为中亚的代名词。这一时期,伊斯兰教还通过和平的形式,被中亚南部地区的商人和苏非派托钵僧传进南俄草原。

三、成吉思汗蒙古人的伊斯兰化

13—15世纪,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成为中亚地区的统治者。由于人数较少,他们虽然是统治者,依然不能逃脱被同化的命运。到14世纪上半叶,蒙古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从统治者和普通游牧民两个阶层同时开始了,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进入中亚、南俄和伊朗高原的成吉思汗后裔们皈依伊斯兰教、实现伊斯兰化的政治目的很明确:他们皈依伊斯兰教首先是为了赢得占境内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的支持和拥护,其次是为了得到农耕地区的大量税收以维持国家及统治阶层的经济需要,最后是为了得到其他穆斯林政权的支持和帮助(如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而一般游牧民的伊斯兰化则更多地是由于经济因素以及从众心理。到15世纪时,成吉思汗蒙古人已经淹没在中亚突厥人和伊斯兰教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在大蒙古国(1219—1259年)时期,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前几代统治者始终“对各教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5](P29)}其宽容的宗教政策,维持了领域辽阔、民族复杂、文化差异较大的大帝国的统治。这个时期,蒙古人(特别是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则保持着自己古老的宗教信仰——萨满教;各蒙古宗王将自己的行政中心和住牧地设在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1260—1264年间,蒙古帝国境内爆发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间的争权战争,统一的大蒙古帝国不复存在,昔日的封地逐渐走向独立,中亚地区先后出现了两个强大的蒙古政权:伏尔加河流域至哈萨克草原地区的金帐汗国,天山南北与帕米尔东西地区的察合台汗国。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亚地区的蒙古统治者及部落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加剧。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是中亚各地蒙古人伊斯兰化的重要时期。根据东方学家巴托尔德考证,14世纪中叶分布在河中及临近地区的四个蒙古部落:扎刺亦儿(分布在忽毡附近一带)、巴鲁剌思(撒马尔罕南部卡什卡河一带)、可陈(阿姆河上游卡马尔平原)和阿鲁剌特(阿富汗北部巴尔赫地区)并非直接从蒙古高原迁移到河中地区,而是经历了一个中转过程。他们先迁到诸如七河、伊犁河这样水草繁茂的草原地区游牧,然后进一步向农耕地区迁移,进入农耕地区以后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游牧半游牧生活方式,才最终走向定居,与当地居民融合。^{[6](P222)}随着河中地区农耕经济和商业贸易的恢复与发展,税收在蒙古汗国经济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经济重心的转移,导致蒙古统治者在统治政策和宗教信仰上进一步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倾斜。

蒙古人突厥化、伊斯兰化的过程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蒙古人被当地居民同化的同时,其影响却以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蒙古人的军事编制、战术、词汇及部分行政管理方式等以变通的形式融入了中亚各民族文化之中,萨满教在经过某些变革以后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成为中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某些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苏非派托钵僧的和平传教与草原游牧人的宗教特色

伊斯兰教在从河中农耕地区向中亚北部、东部草原地区渗透的过程中,以和平传教为主要方式,以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为主要桥梁。13—19世纪,伊斯兰教被苏非传教士和穆斯林商

人传入中亚北部哈萨克族与吉尔吉斯游牧民族之中,从而使伊斯兰教最终在哈萨克草原占据优势,实现了整个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

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说:“一部苏非主义史,也就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7] (P82)} 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发展壮大的整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苏非主义不同派别不断与伊斯兰教主流派及当地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冲突、调和的过程。中亚苏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源于对中亚各种文化资源的整合。各个教团能够根据所处地区社会变迁情况对教义主动进行自我修正,使其顺应时代的发展,达到其目的。由于河中地区纳合什班底耶教团的创立者巴哈丁·纳合什班底(1314/1317—1389年)和第三任教主和卓·阿赫拉尔(1404—1490年)将苏非主义传统的出世观变为入世观,将安于贫穷改造为积极追求财富,使该教派得到了较大地发展。^{[7] (P194)} 阿赫拉尔通过对教义的大胆改革,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成为中亚南部地区最大的僧侣封建主,而且通过结交权贵,成为帖木尔后王卜撒因的精神导师。

苏非主义通过自己的传教士将伊斯兰教传入游牧民中,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善于将伊斯兰教的内容和游牧民族中原有的信仰灵活地结合起来。中亚苏非亚萨维教团的创始人霍加·阿合买德·亚塞维(1103—1166年)首先倡导用突厥语传教,消除了语言隔阂,为伊斯兰教在游牧民中的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亚塞维将伊斯兰教义、教规与哈萨克人奉行的萨满教的宗教习俗相结合,使其易于被当地居民接受。第三,亚塞维运用突厥语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和通俗语言传播宗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亚塞维学说中,安拉的称谓与游牧人崇拜的天神可以互相替换。“亚塞维学说的信徒们在参加祈祷、准备贡献传统食物时,常利用古代突厥习俗。”^{[8] (P376)} 通过亚塞维教团传教士的努力,伊斯兰教在锡尔河中下游的农区和城市占据了优势,并开始向草原地区渗透。哈萨克汗国时期,伊斯兰教已经传入统治者阶层,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开始参与哈萨克汗国举行的一些仪式。处于强大穆斯林文化影响下的哈萨克汗国,其统治者不论是出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上的考虑,皈依伊斯兰教都是有益的。但是游牧人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及其基本的仪式仍然非常贫乏和有限。19世纪中期访问过吉尔吉斯部落的著名哈萨克族学者瓦里罕诺夫在其撰写的一篇游记中说:“所有的野石

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或更多地自称为伊斯兰教徒,但他们不知道任何宗教教义及其圣礼。他们所有的宗教仪式和迷信到现在还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色彩”。“他们的信仰、仪式及萨满教咒语完全与哈萨克人的相似”。“火、月亮和星辰都是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还有许多不知道穆罕默德名字的人。”^{[9] (P71)}

五、俄罗斯征服时期伊斯兰教最终在草原游牧人中占据优势

19世纪中叶,俄国势力进入中亚,先后征服了哈萨克草原与乌兹别克贵族建立的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成为这里新的主人。俄国征服者对中亚地区占优势的伊斯兰教实施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在北部草原地区,他们鼓励居民信仰宗教,出资帮助居民建立清真寺,开办宗教学校,聘请鞑靼教师,使得伊斯兰教知识和仪式在草原游牧民中最终普及并巩固;在中亚南部地区,统治者采取不干涉政策,伊斯兰宗教文化在和俄罗斯文化的竞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发展。

16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俄国扩张势力将大批穆斯林居民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如何处理传统的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遂成为统治者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在18世纪中叶以前,俄国征服者对境内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歧视性政策,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伊斯兰教徒和东正教徒的不平等地位,强迫穆斯林改宗。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682—1725年),随着俄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国内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俄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接触逐渐频繁,迫使其考虑改变宗教政策。普加乔夫大起义被镇压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改变对伊斯兰教的歧视态度,承认伊斯兰教的合法地位,颁布了宗教宽容政策,并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逐渐纳入官方系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哈萨克草原被征服,俄国政府选中了在游牧民中有一定商业、宗教和文化影响的鞑靼毛拉宣传伊斯兰教,试图使游牧民效法鞑靼人,像忠诚于穆罕默德一样忠诚于沙皇。1785年1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从喀山的鞑靼人中选择一批忠诚可靠的人赴哈萨克草原担任毛拉,给他们提供一些经费,根据他们对俄国政府的忠诚程度以及是否尽心,给以巨额奖励。^{[10] (P184)} 毛拉们不仅传播宗教知识,而且教授游牧民儿童学习世俗知识,为草原游牧民培养了第一批本民族的宗教人士。1786年6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给西伯利

亚总督的信中,命令其在辖区内建立城市、清真寺、学校和市场。在政府的号召下,各级地方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修建清真寺、宣传伊斯兰教。俄国官员“对那些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己古老的萨满教的信仰,还很少体验到穆罕默德教义的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坚决地、人为地灌输伊斯兰教,并且把喀山来的鞑靼教士派给他们的苏丹,派到他们的山村去。”^{[11] (P21)}而在哈萨克草原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初期,“各汗国和各苏丹中,只有不多的人对于伊斯兰教义具有模糊的概念。在吉尔吉斯草原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堂,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士举行公共的伊斯兰教礼拜。”^{[12] (P53)}“从1822年开始建立一批州以后,……在每一个阿乌勒都有毛拉和流动的宗教高级学校。如果谁要不坚持三十天的把斋,并且不一天作五次乃玛孜,他就再也没有发言权,也不会得到同族人的尊重。”^{[13] (P303)}

伊斯兰教在游牧民族中的传播,被深深地打上了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游牧地区,“萨满教在哈萨克人中是与伊斯兰教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体被称之为伊斯兰教,皈依了这个宗教的人们尚不知道穆罕默德圣人何人,而是直接信仰真主的。他们以为越崇拜萨满教的灵魂,便是越崇拜穆斯林的圣贤,并在穆斯林圣贤墓地宰杀牲畜作为祭礼,他们一方面信仰巫师,一方面尊敬伊斯兰教的霍加。既崇拜火,也在跳巫神时歌颂真主,呼唤穆斯林的圣贤。如此互相矛盾的东西并不影响哈萨克人对它们的统一信仰。”^{[14] (P473)}皈依伊斯兰教以后的游牧民的宗教文化与河中农耕地区也有诸多区别。首先,宗教首领在游牧民族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司法权掌握在部落首领手中;实施的法律也是符合当时部落生活习俗的习惯法,其中吸纳了少部分关于家庭、婚姻法等方面的宗教条文。其次,在草原游牧民中,伊斯兰教没有像农耕地区那样形成较大的派别和势力。第三,在牧区的夏牧场上几乎没有清真寺,冬牧场虽然有清真寺,但是数量和规模都无法和农区相比;游牧民受生产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像农区居民一样严格按照《古兰经》规定的次数和时间礼拜。第四,游牧民的清真寺没有瓦克甫土地、牧场及牲畜等财产;牧区的毛拉平时和所在部落的牧民一起放牧,各部落的牧民们一旦举行有关的宗教仪式,就请毛拉参加。第五,游牧民的遗产制度较多地保留了宗法社会的习俗,与农耕地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遗产制度不同。

纵观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首先,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历史,

就是其与当地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发生冲突、协调与融合的历史。由于中亚各地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文化既相联系又有差异,因此,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相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有些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反而越来越大。基于此,我们认为那种试图在中亚各国宣传和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人根本就是不懂当地的民族与宗教。其次,从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历史看,伊斯兰教强大的生命力是有目共睹的,其秘密就是:通俗易懂的教义和善于变通的传教者。教义通俗易懂易于被当地居民,特别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广大农牧民所接受。善于变通其含义有二:一是表现在传教士善于根据当地居民的情况对宗教进行变通,不拘泥于仪式、传教语言和个别词句;二是宗教首领善于根据所在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革宗教内容,使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恐怕也是伊斯兰教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根本原因吧。

参考文献:

- [1]伊本·阿西尔.全史[A],第四卷.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第一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第一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世界境域志[M].王志来,周锡娟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打印稿).
- [4]许序雅.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 and 作用[A].中亚学刊[J],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上册.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6]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M].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7]张文德.苏非主义在中亚:思想与历史[J].新疆社会科学,2001,(4).
- [8]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通史[M],第2卷.阿拉木图,1983.
- [9]乔干·瓦力罕诺夫.草原上的伊斯兰教[A].瓦里罕诺夫文集[C],第4卷.阿拉木图,1985.
- [10]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 [11]谢苗诺夫.天山游记[M].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 [12]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M],上册.王之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 [13]瓦里罕诺夫.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历史札记[A].瓦里罕诺夫文集[C],第1卷.阿拉木图,1984.
- [14]瓦里罕诺夫文集[C],第1卷.阿拉木图,1961.

责任编辑 朱健华 英文审校 孟俊一